

罗马教皇的间谍

〔英〕盖拉赫著

重庆出版社



罗马教皇的间谍

〈英〉盖拉赫 著
刘臣刚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重庆

Le titre original de cet ouvrage est:

SCARLET PIMPERNEL OF THE VATICAN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R. Juan

原名:《梵蒂冈的红色平伯尔赖尔》儒昂 译自英文版

PRESSES DE LA CITE Paris

巴黎西岱出版社

责任编辑: 彭 梅

封面设计: 文 涛

罗马教皇的间谍

刘臣刚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大坪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3 字数: 113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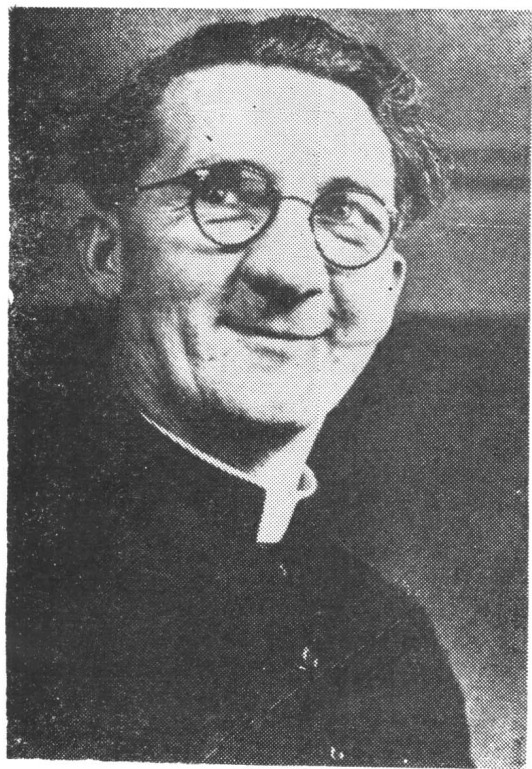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400

书号: 10114·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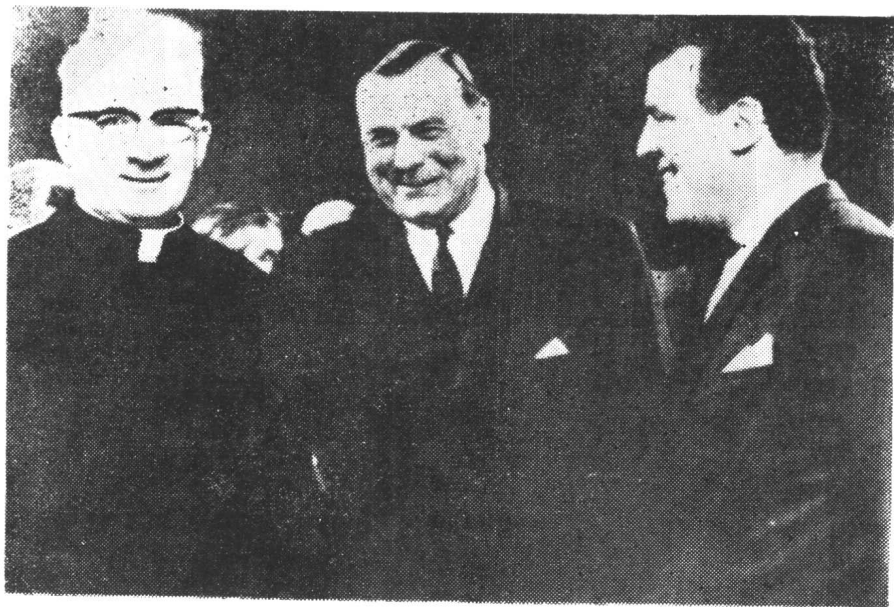
定价: 1.05元



奥弗莱厄蒂主教



梵蒂冈城鸟瞰



奥弗莱厄蒂主教、山姆·德瑞少校摄于1963年二月十九日。



梵蒂冈的花园。里面曾埋着装有该组织秘密档案的饼干筒。

前 言

一九五八年秋，我在圣职部会见奥弗莱厄蒂主教大人之后，便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此书发表在一家报纸上时，我给它取名为《梵蒂冈的红色穆隆》^①。写这本书花了我九年的时间。该书的素材并不来源于主教大人，因为他一直拒绝给我。材料源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士。最困难的无外乎是从虚构中寻找出事实，因为在今天，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只要在罗马一提起奥弗莱厄蒂这个名字，就足以掀起一阵对往事回忆的轩然波涛。其中大部分的缅怀都发自肺腑，他们更关心书的真实性。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在数千名为他所拯救的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许多人都曾经帮助过我。但是我特别应当感谢的是：教廷教义部主持，红衣主教阿尔弗雷多·奥塔维亚尼阁下；爱尔兰克隆非特教区主教，博士，托马斯·赖恩主教大人；罗马条顿公学的M·F·托尔主教大人；爱尔兰耶稣会克朗戈士·伍德学院院长，尊敬的弗朗西斯·乔伊神甫；爱尔兰耶稣会曼格雷特学院院长，尊敬的R·F·罗歇神甫；爱尔兰沃特伍德的拉沙尔修道院院长，尊敬的F·布伦达恩修士；

① 梵蒂冈的红色穆隆：即原著英文书名梵蒂冈的红色平伯尔赖尔。平伯尔赖尔是奥克茜男爵夫人所著的小说。

突尼斯伯爵。H. G. 亚历山大元帅阁下；肖恩·布赖德先生；山姆·德瑞中校；科兰·靳斯里少校；雪瓦利埃太太的女儿，杰玛·桑茨夫人和奥弗莱厄蒂主教大人的妹妹，布莱迪·西罕太太。

我参考的书有：奥弗莱厄蒂主教大人写的罗马指南《罗马·菲利克斯》；德瑞中校著的《罗马的逃亡线》；约翰·费曼中校著的《别害怕》；奥尔登·哈契与西默斯·沃尔什合著的《荣誉的桂冠》；弗朗西斯·麦菲著的《约翰二十三世》；多罗西·麦克阿德尔著的《爱尔兰共和国》；温斯顿·S·丘吉尔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难以捉摸的平伯尔赖尔》中的主人公。在一七九三年，他致力于将那些逃避恐怖时期（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七月这一阶段）的法国人带到英国去。

① 平伯尔赖尔：奥克茜男爵夫人所著的小说。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43年，从意大利集中营逃出来的大批盟军战俘纷纷涌向罗马，希望得到教会当局的保护。以其聪明才智得到教皇赏识的奥弗莱厄蒂主教在无数罗马市民和传教士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逃亡组织，帮助盟军士兵重返战场，并以他神奇的力量同德寇周旋，从而挽救了三千多名逃亡战俘的生命。战争结束时，他默默地消失在狂欢的人流中，继续去执行他的“把上帝的爱带给所有的人”的崇高使命。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一个敌视英国的年轻人.....	(1)
第二章 上帝的信使.....	(13)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	(22)
第四章 《我想收回那条给我带来好运气的高尔夫球裤》.....	(32)
第五章 搬煤工与盖世太保.....	(43)
第六章 一个后悔的犹太.....	(56)
第七章 英国人介入.....	(66)
第八章 密探与电台的罗密欧.....	(80)
第九章 圣诞节.....与困难时期的到来.....	(94)
第十章 跟踪、逮捕与折磨.....	(105)
第十一章 为英国的打算进行的间谍活动.....	(117)
第十二章 一条通往黑衫队司令部的“热线”.....	(130)
第十三章 血腥的三月.....	(139)
第十四章 他们什么时候才来?	(151)
第十五章 敌人乞求帮助.....	(161)
第十六章 奖赏与惩罚.....	(170)

第 一 章

一个敌视英国的年轻人

在罗马被德国人占领时期，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一辆黑色大轿车飞快地驶上通往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协和大街。可是它并没有驶进那个宽阔的广场，只是在伯尔兰柱廊两翼间的地上用油漆画的一条白线边停了下来。在这条线的旁边站着四名身佩冲锋枪的德国伞兵。罗马黑衫队头目，赫伯特·卡普勒上校从车上下来，身后尾随着两名身穿便衣，佩盖世太保标志的汉子。卡普勒指着广场的另一端，那里可通往大教堂的二十二级台阶的左边。一个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的高大身影在教堂的阴暗处时隐时现。他头戴一顶宽大的黑帽子，身穿红色饰边的法衣。三百米开外的距离是看不清他的面孔的，可是当他从日经课书上抬头注视那些新来的人时，可以看到从他的眼镜上反射出来的阳光。一些罗马人在台阶上悠闲地来来往往。对于一个暗杀阴谋来说，这个场面太平静了，背景也太离奇了。因为卡普勒上校来此的目的是布置一次谋杀，而不是视察纳粹警卫。

“你们看见他了吗？”他对自己的打手说，“就是他……休·奥弗莱厄蒂主教，一个疯狂而危险的爱尔兰籍传教士，

要是让他活着那太危险了。与罗马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必须到此为止。要是我们在梵蒂冈的领土外抓住他^①，我们会逮捕他的。他也完全明白这一点。可是多次试图引诱他越过这条线都失败了。然而，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溜进城，却从来没有被我们发现过。既然我们不可能从正面去抓他，那么我们就从他后面下手。好好听着，他不认识你们……你们从未在此值过勤吗？没有？那好……你们明天到圣皮埃尔大教堂去参加弥撒。明天是个瞻礼日，去的人一定会很多。弥撒结束后，你们同其他人一道出来，经过现在正好在他身后的那道门。抓住他，迫使他走下台阶，越过这条线。然后当你们带着他走进旁边一条路时，便暂时放开他……我不想要活的，当然也不想来一次正规的判决。当他想逃跑时就结束他的性命。明白吗？”

两名盖世太保默默地点点头，他俩完全明白，也了解整个程序。这事计划得并不特别精明，卡普勒实在是黔驴技穷，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就在当天晚上，一个身穿黑上衣，灰长裤，磨损的衣领上系着黑领带的，身材矮小的胖子匆忙走进了奥弗莱厄蒂的小办公室。

“主教大人，”他说，“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您认识吉尤塞浦吗？就是我们在警察局的那位‘联络员’。呃，他刚才通知

^① 一九二九年，教皇帕依十一世与墨索里尼之间的拉特兰协议承认教皇对梵蒂冈政府的主权。协议承认其政府的治外法权，也承认在整个战争期间，在梵蒂冈住有同盟国向圣廷派驻的外交人员。——法译者 注

我说卡普勒搞了个可爱的计划，明天要绑架您。他们将要如何搞，目前我知道的还不确切，不过这两天您最好还是不要站在台阶上。

四十六岁的奥弗莱厄蒂站了起来，他身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九十二公斤。曾经是田径运动员和业余拳击手。他琅声大笑，说：

“他们以为这样就会使我害怕了吗？只要他们不用枪，那怕把殴斗完全搬到圣皮埃尔大教堂这台阶上来，我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两，三个人……不是吗？”

这位名叫约翰·梅的小个子轻声咳了一下说：

“主教大人，这得仔细考虑一下。如果那些纳粹分子明天不成功，他们势必还要在以后某一天下手的。这一次我们就差点没事先得到通知。总而言之，吉尤塞浦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认为需要教训教训一下这个卡普勒。主教大人。要是您愿意让我去干……”

“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您的那些计划，约翰。”奥弗莱厄蒂微笑着说，“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呆在那儿，象平常那样。”

梅并不寄希望于机遇巧合，他叫人送了一封信给吉尤塞浦。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年青的情报员同非天主教徒的梅便一块儿去圣皮埃尔大教堂参加弥撒了。

紧靠大教堂入口的右边，首先入目的是一排整齐的四十四个祭台，可以接纳十万教徒。两个黑衫队便衣就呆在那个放置着米开朗基罗所雕，并唯一留下作者姓名的圣母哀痛耶稣

像的祭台里。假惺惺地低垂着头，双手合十。吉尤塞浦对着这两人打了个手势，梅便向刚走进来的四名瑞士警卫丢个眼色。大教堂里充满了传教士们做弥撒的喃喃颂经声，来望弥撒的妇女的鞋跟在大理石地面的敲击声。在空中飘逸的钟声。四名警卫蹑足向前，在每个黑衫队员身旁站一名。身后站一名。一下轻轻的拍肩，一个漂亮的指向大门的手势，便使德国人明白过来了。只好悄悄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俩走出大门时，奥弗莱厄蒂在壮实的警卫保护下站在那儿，他俩只好谦卑地从他面前走过，后面尾随着面带笑容的梅。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稍稍后退了一点，给他们让开路。在他经常戴的那副廉价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蓝色的，激动的，充满着嘲笑意味的眼睛。这两个德国人被带着走下台阶，朝站着德国伞兵的那条白线走去。走到一半。听到梅向警卫队长叽咕了几句，这两个德国人便突然紧张起来。警卫轻轻地，然而却很坚决地把他俩推向圣职部所在的那条街道上。在那儿他们仍然是站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土地上。那些伞兵就是认出了卡普勒手下的人。也不可能进行干预。梅早已准备好了一个由憎恨德国人的南斯拉夫人组成的“接应委员会”。这两个被揍得昏迷不醒的黑衫队员事后向卡普勒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

奥弗莱厄蒂。这位被德国人视作在罗马的灾星，圣城中
最“受欢迎”的人又一次占了上风。这位穿着红色饰边法衣，和蔼可亲而又正直的传教士，梵蒂冈的“红色穆隆”，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尽管他一直都憎恨英国人，可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拯救了同盟国阵营的许多不同国籍的人的生命。他在罗马的条顿公学里领导着一个巨大的逃亡组织，他掌握着一条通向黑衫队总部的秘密“路线”，他敢于日夜在城里奔波，在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台阶上等候所有那些怕遭逮捕、受折磨和受处决的人。这样便构成了对德国人的威胁。比如，从一九四三年冬到一九四四年这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他都照管着一、两百名逃亡战俘——从普通士兵到将军——这些都是他用最危险的方式，有时穿上他的法衣，有时大张旗鼓，将他们从敌人魔爪下救出后，藏在反法西斯的罗马人家里或一些修道院里。

休·约瑟夫·奥弗莱厄蒂，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爱尔兰克里郡的基拉尔尼市。父亲叫詹姆士·奥弗莱厄蒂，母亲叫玛格丽特。在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中，他是老大。三个男孩都在由耶稣会修士们举办的基拉尔尼修道院学校读过书。也许休从小就想当一个传教士，因而在十五岁时他已在该修道院获得一个教职，一任三年。他获得过皇家助学金从而进入拉沙尔市的培养圣约翰——浸礼会修士的沃特伍德学院。可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夏患了胸膜炎。因而毕业考试失利。由于他一直决心要成为一名传教士。他请求进圣心教廷学校读书。该校以曼格雷特学院这一名称在利默里克郡更为出名。该校培养传教士，是耶稣会兴办的，免费招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男孩。

尽管休大大超过了年龄限制，他仍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进入该院学习。由于他的英语很棒，又有大量的商业知

识，因而备受赏识，但是他从未学过拉丁语，所以尽管他个子高大，体格强健，进入曼格雷特学院后还是被编入最年轻的一班。可是他飞快地赶了上去。总的说来，他在宗教各学科方面要比一般的学科更为突出。在基拉尔尼和沃特伍德学习期间他就已经学会了打高尔夫球，并为此入迷。他既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拳击手，同时在手球和曲棍球上也是行家。由于那时正是爱尔兰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的时代，因此他又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他在曼格雷特时的同学们还深深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一个早上，从大西洋吹来的夹着暴风雨的乌云使学校的食堂显得阴沉沉的。可这坏天气并没有使那些吃完早饭的四十五个学生垂头丧气。因为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去度圣诞节假期了。往常要求学生们在用餐时要严肃。可这次，学监们容忍了那活跃的气氛，热烈的谈话，甚至还容忍了从那张围坐着十来个学生的桌上传来的哄笑声。这十来个学生正在听高大而瘦削的奥弗莱厄蒂讲一个滑稽故事。他自己放声大笑结束了故事。正在他准备接下去讲第二个时，一位负责分发早上送来的信件的学监从他肩上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笑容立即从他脸上消失，代之以愤怒的表情。同学们也因此停住了哄笑。一个个全都静悄悄地看着他。

“黑狗们枪杀了克里斯·吕西。”他终于说道，“这是他们今年杀害的曼格雷特的第四个学生。”

一九二〇年是爱尔兰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英国人为了镇压起义。不但使用了正规部队和后备部队，还用上了“黑

狗”(特种警察)。这名称源自他们那身黑色制服。这支卑鄙下流的部队是由那些该上绞架的坏蛋、为了用来卖命而释放的罪犯、未受到惩戒的谋杀犯组成的。那些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的英国军官都纷纷辞了职。坐在奥弗莱厄蒂那张桌子周围的孩子们都是些活跃的共和主义者——人们称之为“IRA（爱尔兰共和军）之席”——他们大声喊到：“总有一天我们会叫英国人流尽他们的血！”十来个拳头击在桌子上，震得餐具都跳了起来。虽然是孩子气的表示。但是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感情。食堂内的其他孩子一动也不动，有些还露出宽容的微笑，另一些则暗自高兴，只有几个英国学生露出局促不安的神色。奥弗莱厄蒂扭头对身旁一位同学，用一种狂怒的语气说：

“听说英国人在战争中把德国人当成汉斯^①！遗憾的是德国人没有赢得这场战争、抓住藏在白厅里的劳埃德·乔治和英国那些大臣们。”

话出自一个未来的传教士之口是十分强硬的，甚至可说是满带仇恨。不过爱尔兰当时的确是处在残酷的岁月里。一九二〇年的《曼格雷特报》不仅刊登了奥弗莱厄蒂提到的那四位年轻人的讣告（有一个年轻人是被枪杀在自己母亲面前），而且还登了学校专栏，奥弗莱厄蒂为这个专栏撰了稿。文章写道：“十一月一日是诸圣瞻礼节，可是整个节日却因院长收到凯温·贝利的母亲发来的电报而笼罩着一片悲哀的

① 汉斯：对德国士兵的贬称。

——中译者注

气氛。电报说她那诚实的儿子在清晨被杀害了。我们都把凯温·贝利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英勇的死难道不应该成为对爱尔兰孩子们的永恒的激励吗？”凯温·贝利是在都柏林的蒙特乔伊监狱里被绞死的，尽管他只有十八岁。他的死也许比所有其它的事情更能有助于坚定爱尔兰的抵抗和使志愿者加入共和军的行列。同一天，爱尔兰皇家宪兵枪杀了爱伦·奎茵。当宪兵从一辆飞驰的卡车上向她开枪时，她正坐在自己花园的矮墙上，怀中抱着自己的孩子。而军方调查却宣称开枪是“一种预防措施”。

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每天都有无数的男人，妇女，儿童被屠杀。八岁的安妮·奥尼尔被一辆卡车上射出的子弹击中时，他正在门廊下，处身于一群和平的人之中……人们在高尔韦郡的一块沼泽地里发现了米歇尔·格里芬神甫的尸体……在科克郡班顿市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几个后备役士兵碰见了议事司铎马涅，当时他正在同提莫菲·克罗列伊及一位因某种原因停下车来的开车人谈话。一开始士兵们对他三人凌辱了一番，随后哈特准尉突然一枪将克罗列伊打死。司铎想提出抗议，也被枪杀。开车人是一位法官，他要求当局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说哈特“犯了罪，但是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

这类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在爱尔兰学生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奥弗莱厄蒂的父亲原是皇家宪兵队的一名中士，但是他不愿为屠杀自己的同胞卖力，因而同其他几百名宪兵一